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共产党宣言》的深远影响

□ 杨明伟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伟大变革历史进程的当事人,毛泽东特别钟爱《共产党宣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善于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自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起,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便与他结下不解之缘。据毛泽东回忆,他是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一生。据统计,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939年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后来他还说过,自己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已经无法统计。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了一生,也向党内外推荐了一生。

通过梳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比如: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受《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启发,深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不断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思想智慧和解决难题的办法;在延安整风期间,他特别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原著,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反复研读并不断向党推荐《共产党宣言》,宣介其中的重要思想,引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干

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读《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又比如: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不断阐发《共产党宣言》里的思想,阐明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甚至挫折后,毛泽东进一步读《共产党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包括英文版在内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他不断向党推荐《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第一部著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宣言》。

结合历史的长河客观辩证地看,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都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毛泽东讲上面这些话,是在1941年9月,在讲《关于农村调查》问题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惜很多同志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的,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他还讲:“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去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去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讲了前面提到的那一段有关“阶级斗争”的话。意在提醒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工

作的同志,要深入中国农村,“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那么,《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到底对毛泽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或者是为了解答实践中出现的思想疑难。读《共产党宣言》更是如此。毛泽东曾经在提到他最早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得到什么启发时说过:“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在延安时期他还说过:“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他还说过:“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缅怀毛泽东》上册,第400~401页)

带着问题读,遇到难题读,读懂以后再与实践相结合,把其中的深刻道理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这些,就是毛泽东研读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的基本流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如此,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亦如此,毛泽东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丰富的智慧、宽广的思路和有效的办法。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己研读以及不断提倡全党阅读马列著作的情况来看,每当他特别提出要重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时候,大都是中国社会实践出现波折或者思想认识上出现疑惑的时候,毛泽东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做法,就是从《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初心,正像他经常提醒大家的,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桥梁。

(三)为确保“伟大的党”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伟大的目

标”,毛泽东不断以《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党的各级干部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和素养,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他指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第2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持续不断地制订了培养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的计划,并组织实施。毛泽东历来主张,培养训练干部最核心的内容和首要的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就是首本学习教材。毛泽东提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应该说,终身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1918年4月14日,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齐聚在湖南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起初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第22页)。尽管新民学会人数不算多,从最初的13人,到后来发展到70多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的记载,参会人员共有12人;亲历者萧山、周世钊等回忆有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则说有14人。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13人说。据笔者查阅,关于新民学会到底有多少说法大致有4种,而《湖南共青团团志》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通信集》等资料,共析出了74个会员名单),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会员是一批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首先,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湖南是全国建党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近20名党员,约占全国党员总数(58名)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党员中新民学会会员又占大多数。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戴乐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称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后来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其次,新民学会先进分子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理论与中国共党史名称。这主要集中在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之中。蔡和森首次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且要求按照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第53页)。对于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53页、第162页)这是当时理论水平高、阐述系统具体且整套马列主义建党主张,而且这些建党思想并非共产国际输入和帮助的产物,而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独立提出的。

再次,新民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刊发大量文章,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思想,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新民学会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取舍也由他决定,发行不仅限于湖南一隅,还远销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其中多篇文章被《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转载,影响广泛。《湘江评论》由李大钊盛赞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版),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

认同的政治维度,如深入探讨了孙中山、孙科等人偏重于政治性的“中华国族”论;也关注先驱者从文化认同上整合中华民族一体的各种构想与努力,如书中提到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一文中称中华民族“乃为文化之族名”等。

该书不仅重视从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中华民族”之概念史、观念史,也注重从社会接受角度考察中华民族认同“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广泛认同的发展历程”。全书不仅考察了孙中山、梁启超、杨度、李大钊、王光祈等政治或思想精英的中华民国观,也关注到清末满族官员和留日旗人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认同;关注到20年代后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中华民族”观;关注到夏德溥的《中华六族同袍考》、申闻声的《中华民族特性论》等论著从学术角度对“中华民族”观进行的探讨,尤其是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所引发的学界讨论;关注到中学史地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民初“国歌”与《义勇军进行曲》等对“中华民族”符号的传播、报纸杂志对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传播及其他形式的中华民族观念社会化表述。正是这种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使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少数人的精英思想变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最终蔚成一个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且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作者系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标”,毛泽东不断以《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党的各级干部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水平和素养,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他指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第2页)。“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持续不断地制订了培养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的计划,并组织实施。毛泽东历来主张,培养训练干部最核心的内容和首要的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就是首本学习教材。毛泽东提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应该说,终身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1918年4月14日,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齐聚在湖南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起初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第22页)。尽管新民学会人数不算多,从最初的13人,到后来发展到70多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的记载,参会人员共有12人;亲历者萧山、周世钊等回忆有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则说有14人。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13人说。据笔者查阅,关于新民学会到底有多少说法大致有4种,而《湖南共青团团志》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通信集》等资料,共析出了74个会员名单),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会员是一批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首先,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湖南是全国建党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近20名党员,约占全国党员总数(58名)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党员中新民学会会员又占大多数。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戴乐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称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后来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其次,新民学会先进分子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理论与中国共党史名称。这主要集中在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之中。蔡和森首次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且要求按照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第53页)。对于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53页、第162页)这是当时理论水平高、阐述系统具体且整套马列主义建党主张,而且这些建党思想并非共产国际输入和帮助的产物,而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独立提出的。

再次,新民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刊发大量文章,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思想,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新民学会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取舍也由他决定,发行不仅限于湖南一隅,还远销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其中多篇文章被《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转载,影响广泛。《湘江评论》由李大钊盛赞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版),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

党史钩沉

及庸民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1918年4月14日,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齐聚在湖南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起初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第22页)。尽管新民学会人数不算多,从最初的13人,到后来发展到70多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的记载,参会人员共有12人;亲历者萧山、周世钊等回忆有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则说有14人。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13人说。据笔者查阅,关于新民学会到底有多少说法大致有4种,而《湖南共青团团志》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通信集》等资料,共析出了74个会员名单),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会员是一批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首先,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湖南是全国建党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近20名党员,约占全国党员总数(58名)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党员中新民学会会员又占大多数。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戴乐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称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后来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其次,新民学会先进分子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理论与中国共党史名称。这主要集中在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之中。蔡和森首次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且要求按照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第53页)。对于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53页、第162页)这是当时理论水平高、阐述系统具体且整套马列主义建党主张,而且这些建党思想并非共产国际输入和帮助的产物,而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独立提出的。

再次,新民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刊发大量文章,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思想,赞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新民学会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取舍也由他决定,发行不仅限于湖南一隅,还远销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其中多篇文章被《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转载,影响广泛。《湘江评论》由李大钊盛赞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版),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

开始觉悟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新民学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有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从青年时代就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理想。经过不断努力探索,他们日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最终带领党和国家人民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只有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才能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坚定不移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其次,新民学会的学习传统对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有重大借鉴意义。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的学习,学习是我们党成长壮大的“秘密武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为向国外学习和发展,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早晚工余之暇,他们“猛看猛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128页)。国内会员每隔一周都要开会一次,每次都有中心内容,或讨论某个学术问题,或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或报告个人学习计划,以相互督促(《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394~395页)。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新民学会时期的刻苦学习,毛泽东、蔡和森等就很难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发扬和借鉴新民学会的刻苦学习优良传统,对于共产党人增强执政能力,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再次,新民学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民学会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学会会章明确规定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五不”纪律,人会须满足勤奋、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会员必须具备“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三大作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第3页、第8~9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新民学会的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党和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和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扬光大。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社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13@ZH018)阶段性成果)

图书推介

探寻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传播的历史轨迹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简评

□ 俞祖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一词则是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才开始正式使用的。它从上个世纪初少数精英偶尔使用,含义不定的新名词、新概念,经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推动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战烽火洗礼,日益为各民族、各政党、各界群众所广泛认同与普遍认可,最终“成为人们口口相传、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和概念”,成为全体中国人“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黄兴涛教授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观念生成与传播,或者说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进行了历时性、全方位的探究考察与梳理分析,为学界奉献了考证与义理兼备、历史厚重与现实关怀兼备的学术成果。

该书将纵向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历史进程”与横向展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不断传播扩展、“最终得到社会上广泛认同的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将上层精英思想文本的解读与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文化媒介公共话语、民众心态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呈现了该观念生成、演变与传播过程中的古今交汇、中外激荡、上下互动、情理交融的丰富内涵与生动面相。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分为4章,也就是按4个阶段,书写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的生成演变轨迹:“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在重塑“中国”“中华”“中国人”等古老概念的基础上,梁启超、杨度等人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且在這一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民国前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观念的明确提出和全民认同创造了条件,融合五族、推动民族平等融合成为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民国初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到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一词走进了国共两党的政纲且“已开始在中国被愈来愈多地加以使用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尤其是次年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明确认同孙中山晚年倡导的“大中华民族”理念并强化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倡导与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促使“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深化,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因之传遍大江南北;“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观两种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混形态并存。书中提到“中华民族”一词在上世纪初诞生,“最初人们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 邮箱:gmrbd@s163.com